

对欧阳修政治思想地位的一点估价

李卫东

(社会科学部)

摘要 欧阳修政治思想是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础构建的,因而体系较为完备而严密,并对宋代政治思潮具有丰富与启迪作用。处在危机四伏的北宋中期的欧阳修,其政治主张着眼于解决时弊,挽救危机,故其政治思想又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王道政治;仁政;功利

分类号 K244

0 引言

欧阳修是北宋历史中一位重要人物。长期以来,学界对欧阳修政治思想的阐述显得十分薄弱,尤其是对其政治思想的意义和在宋代政治思潮中的地位作出估价尚无文章论及。故在拙文中就此问题作些讨论。

1 较为完备的政治思想体系

欧阳修的政治思想,是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础构建的。

欧阳修继承并吸收战国时期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况的天人思想,在此之上形成了他的天人观。他认为,所谓的“天”,指的是自然界:“天,吾不知其心,吾见其亏盈于物者矣”。^[1]天是运动变化的,“天地升降而不息,故曰:‘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2]天地一升一降,运动不息,这具有朴素辩证法的因素。在天人关系上,欧阳修主张“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3]他既承认天与人之间的联系,又明确划清了它们之间的区别与界限。欧阳修还提出了“治乱在于人而天不与”^[4]的观点,以阐述其“不以天参人”的主张,认为“以天参人则人事惑”,^[5]反对天命论和谶纬迷信。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承继荀况“明于天人之分”的朴素唯物主义主张。另一方面,欧阳修主张“不绝天于人”,也就是要知天,认为天道是可以被认识的,并根据对天的认识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如不知天,则被视为弊政之一。欧阳修曾把“不量天力之所任”作为耗农之一大弊病。^[6]

欧阳修的天人观,培植了他在政治方面积极进取的精神。当他面对北宋社会现实时,能够提出改革时弊、变通政治的主张。因此,欧阳修的天人观是其用人思想、富国强兵主张的理论基

收稿日期:1995-02-24.

李卫东,男,1964年生,讲师。

础。

中国古代所谓的人性问题,主要就是人的善恶问题,即关于人的善恶是怎样产生的问题,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家长期讨论的重要问题。欧阳修在人性问题上,主张性无善恶论。他认为“性者,与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矣,性之善恶不必究也”。^[7]人性虽没有善恶之分,但后天环境对其影响是很大的。欧阳修认为,人性触物而动产生种种情感和欲望:“《乐记》亦曰:‘感物而动,性之欲者’”。^[8]情和欲是偏的,恶的,必须用礼乐来矫饰、引导。“夫礼之为物,圣人之所以饰人之情,而闭其邪僻之具也”。^[9]只有通过礼乐的调节,从而复情于性,保持本有的心性,这样人就能成为圣贤,社会也就进入太平盛世了,而这也正是欧阳修在政治思想上提倡礼治和德治的哲学依据。

欧阳修在社会历史观上表现为崇尚王道政治。他所提倡的王道政治具备如下特点。

第一,具有完备的封建纲常名教。他说:“王道备而习俗成,仁义礼乐达于学,孝慈友悌达于家,居有教养之渐,进有福爵之功”。^[10]由此可见,欧阳修的王道政治,就是要用孔孟的仁义礼乐观来教导人民,从而“问于其俗而婚丧饮食皆中礼节,入于其里而长幼相孝慈于其家,行于其邻而少者扶其羸老,壮者代其负荷于道路。”^[11]实现了王道政治,社会也就跨进了理想的境地。

第二,欧阳修所推崇的王道政治具有国力强盛的特点。他把“树桑麻”、“畜鸡豚”、“养生送死”之类的经济生活作为王道政治的物质基础。“孔子之后,惟孟轲最为知道,然其言不过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12]因此,欧阳修所憧憬的王道政治是一个经济发达、人民生活殷实的强盛国家,“天下之富可如文景之富,奋发威烈以耀名可如汉武帝、唐太宗之显赫。”^[13]

第三,欧阳修把言路开通的理想政治格局作为其王道政治的特点之一。他很赞赏尧舜时代君主善于纳谏、广开言路的做法。“舜之于事,必问于人而择焉,故曰:‘舜好问’”。^[14]尧舜时代广开言路的原因,是为了对王道政治实行中产生的偏颇能及时予以纠正:“王道之寝微寝昌,生民之或仁或鄙,理有未烛。”^[15]因而必须广览兼听,使言路畅通。

可见,欧阳修在社会历史观上所推崇的王道政治,它既包括建立一个“有礼”、“有序”的理想社会,实现言路开通的政治局面,而且在王道政治下,财用充实,国力强盛。欧阳修的社会历史观,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思想基础。他在社会历史观上提出的王道政治,是欧阳修构建其政治思想的出发点。

总之,欧阳修的天人观、人性论和社会历史观,是其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尤其在社会历史观上,他崇尚王道政治,希图建立一个“王政明”、“礼义充”的理想社会,并使社会进入国力鼎盛的太平盛世。在此基础上,欧阳修以实现王道政治为目的构建了他的政治思想体系,他的礼治、德治思想,谏议思想,用人思想和富国强兵思想都是围绕这一中心而展开的。

2 针砭时弊的现实意义

北宋中期,宋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出现了深刻的危机,形成了内忧外患的局面。宋初,太祖赵匡胤为了结束五代以来割据分裂局面,巩固其封建统治,曾经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但由于政策的矫枉过正,这些措施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后果。至宋仁宗时期,已经形成了“冗官”、“冗兵”、“冗费”三大弊病,“三冗”带来了难以摆脱的财政危机;同时,国内阶级

矛盾也十分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16]从而使统治岌岌可危。北宋中期,不仅内政弊端丛生,而且外患严重。由于军政的腐败,导致对辽、西夏战争屡屡失利,并大都以北宋增输岁币、屈辱妥协而告终。此种社会现实,使欧阳修能避免象许多迂儒那样,脱离实际地营构其王道政治的理想,而是紧密结合北宋的社会现状,在不断批判时弊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政治主张。所以,欧阳修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

欧阳修的礼治、德治主张是直接服务于北宋社会现实的。北宋中期,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士兵反叛也屡有发生。思想界佛、道盛行,儒家思想尚未完全占据人们的精神世界。在欧阳修看来,这些都是当时纪纲散坏所造成的。因此,他主张复兴儒家礼法,以礼来统一和约束人们的思想:一方面将礼运用于现实政治中,宣扬“忠信为臣”的思想,培养官吏忠君守节的风气;另一方面,欧阳修也重视用礼来感化百姓,使“风俗淳厚,民无不轨之心。”^[17]而对于有着一整套规章仪式的佛教,更必须用儒家礼乐来与之相抗衡,弘扬儒家礼义学说,让儒家礼乐仁义思想占据人们的精神世界,以此来抵制佛教思想对百姓的影响。与此同时,欧阳修还主张运用封建道德仁义来感化人民,从而消弭他们的反抗精神,达到巩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目的。为此,《宋史·忠义传序》也曾评论道:“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说论倡于朝,于是中外士绅知以名节相交,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18]

欧阳修的谏议思想是为实现王道政治服务的,但同时对当时的现实政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主张健全谏官制度,加强和扩大谏官职能,鼓励谏官大胆言事,要求君主虚心纳谏,还建议百官廷议王朝大事,以达开通言路的目的。正是由于欧阳修等人的极言倡导,“以言事相高”,从而使庆历年间言路大为畅通,宋仁宗由原来禁止“越职言事”,转为“诏求直言”。谏官势力也得到加强,以前朝廷只设置两名谏官,庆历年间增至四名,谏官权限也扩大了。这些都使得谏官能在“庆历新政”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扶持范仲淹、韩琦上台,赶走保守派代表吕夷简,为新政出谋划策等。

欧阳修的用人思想和富国强兵思想,它既是实现王道政治的重要步骤,同时更是改革时弊的具体措施,是欧阳修针对当时“无可任之臣”、“无财用”、“无兵”、“无将”的现状而提出的救弊主张。北宋仁宗时,封建统治已危机四伏,欧阳修对此曾有清醒的认识:“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恶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需者财用,今财用乏矣。”^[19]欧阳修把当时人才、财用、兵将方面的问题看作是北宋统治危机的突出表现。而解决的途径何在?他提出:通过对北宋用人制度进行改革,选拔可任之臣;通过发展经济,实现国富目的;通过改革军队旧弊,提高军队战斗力,达到强兵目的。

北宋专制主义统治和选官制度的弊病,一方面形成了官员冗滥的政治问题,同时又带来了人才匮乏的危机。宋初,为了防止大臣擅权,不断地广设官位,扩大官僚机构,以使其互相牵制,并分散和削弱官吏的权力,从而造成了官僚机构的层床叠架,不可避免地产生冗官。另外,北宋官员的选拔和升降制度,是不断产生冗官的重要来源。如官吏的恩荫制,宋室、外戚、大官僚遇到郊礼或皇帝生辰等重大节日,可以奏请皇上封荫自己的子孙或亲属门客为官。再者在磨勘制下,官员升迁的多,降职的少,入仕的多,退職的少,这样官僚队伍当然要不断壮大。旧的选官制度还使国家选拔不到优秀人才,如磨勘制只讲资历年限,不看人才成绩,结果使“贤愚同滞”;旧的科举制度重视诗赋,轻视策、论,使选拔上来的官吏往往“愚鲁不晓事”。欧阳修敏锐地觉察到

了上述问题,因而他能提出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补救,如他的“德”、“才”、“劳”选官标准,意在打破循资升迁的磨勘制,使朝廷能不拘一格广选人才。他反对荫补授官,主张按察官吏,行举官法,这些主张对消除冗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他关于科举制的改革,欲使国家选拔有用之才,并被王安石所继承。王安石在欧阳修等人的科举改革主张基础上,吸取他们重视策论的精神,进而罢去诗赋、墨义,而专以策、论取士,从而使北宋科举制度走向完善。欧阳修关于北宋选官制度的改革主张,大多是在“庆历新政”中提出的,与范仲淹在“新政”中提出的用人方面的改革措施基本一致,并同为仁宗采纳,著为诏令。如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十月“颁新定磨勘法”,十一月“更荫补法”,“更定科举法”。^[20]

对于北宋军政方面的腐败现象,欧阳修也看得十分清楚。他将当时北宋军政弊端归纳为三点:兵冗、兵骄、缺乏将才,并针对问题提出了补救办法。首先要选将练兵,淘汰老劣。同时,欧阳修吸取历史上“骄兵生祸”的教训,主张对“作乱”士兵“立法以制之”,使“兵戎畏肃,不致骄恣”,提高军队战斗力。^[21]欧阳修还认识到双方战争的较量,其实是双方财力的竞赛,因此他主张实行军屯,以奠定强兵的物质基础。^[22]

可见,欧阳修的用人思想和富国强兵思想,具有浓郁的时代感,是为深陷危机的北宋王朝政治开出一剂良药,因此对改革时弊、稳定统治是十分有用的。

3 对宋代政治思想的丰富与启迪

宋代政治思想史上有两种比较突出的思潮,即仁政思想和功利思想,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在宋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商品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条件下,土地也作为商品卷入市场,土地买卖和转移日益频繁,出现了“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趋势。同时,唐中叶以降,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国家对土地买卖的限制也越来越宽弛,造成了私有土地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宋代实行的“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实是对上述两种趋势的认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大大推动了大地主私有土地的发展,使兼并土地蔚为风气。土地兼并的不断发展造成大批农民破产并陷入无法生存的困境。同时,宋代为维持冗滥的官僚队伍和庞大的军队,还有经常性的对外赔款,更加疯狂地搜刮民财,使农民负担大为加重,导致了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从这种现状出发,宋代不少政治家认为,要维护统治,缓解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对抗,就要实施儒家的仁政主张,因而在宋代政治思想史上形成一种提倡仁政的思潮,欧阳修、司马光、程颢、程颐、朱熹都是这种思潮的倡导者。欧阳修的仁政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德治主张上,并有其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它以人性论和历史观为基础,主张统治者进行自身的德行修养,用封建道德去感化百姓,并做到宽简安民。二程和朱熹的仁政思想大抵也没有超过此范围,只是随着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二程和朱熹的仁政思想体系显得更加完善和精致。

思想是社会存在的产物,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变化,会相应引起思想的某些变化。正是在宋代商品经济繁荣和统治危机的双重刺激下,宋代出现了一批敢于面对现实,不尚空谈,主张改革,提倡功利,勇于进取务实的政治家,欧阳修就是其中一个代表。

《容斋随笔》卷四记载《张芸叟与石司理书》中说:“顷游京师,求谒先达之门,每听欧阳文忠公、司马温公、王荆公之论,于行义文史为多,惟欧阳修多教吏事。”^[23]因此,在政治实践上,欧

阳修是个实干家。他曾说：“今必欲日新求治，革弊救新，则须在力行，方能济务”。^[24] 欧阳修希望通过“力行”来改变北宋的政治积弊。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他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时间仅一年，便将全路地理形势，官吏优劣，资财所出，兵精器械和戎卒教练情况，分门别类，编印成册，对政事补益甚多。欧阳修在其政治思想上，能够直面当时的政治弊端，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改革主张，这些政治主张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如在用人思想上，欧阳修提出了“德”、“才”、“劳”的选官标准，主张以才能和功劳的大小作为升迁的重要依据。他的科举考试的改革，其宗旨是为了选拔有实际才干的官员。他曾赞扬北宋大臣王旦说：“公于用人，不以名誉，必求其实”，^[25] 这都说明欧阳修很重视用人的实际功效。他的富国强兵主张更充分体现了注重实效、务从实际的功利精神。他提出要重视发展农业，以增加财政收入，达到富国目的。在商业政策上，欧阳修比较了“抑商”与“与商共利”两种经济政策收益的大小，从而得出要“与商共利”的结论。在强兵主张上，他批评朝廷“不思实效”的选兵政策，兵虽多但无用。提出要裁减冗兵，使兵精而有实用。总之，欧阳修的用人思想和富国强兵主张，从当时实际出发，着眼于解决财用、人才、兵将方面的严重危机，贯彻了巩固封建统治的功利目的。

宋代功利思想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以李觏为代表的理论准备时期，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付诸实践时期，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完善时期。欧阳修的功利思想，以天人观、历史观为基础，把富国强兵作为其主要内容，在体系上已初具规模。当然，与同时代的李觏的功利思想比较起来，却又稍逊逊色，不如李觏的系统、深刻。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欧阳修功利思想的出现，对宋代准备时期的功利理论是一大丰富。同时，欧阳修功利主张为宋代功利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启迪。刘子健先生认为：“其实欧阳修讲致用……，讲功利，王安石继之而起”。^[26] 曹德本先生在其力作《宋元明清政治思想研究》中也认为：宋代功利理论发端于李觏、欧阳修，并由王安石、陈亮等人继承、发展和完善。^[27] 可见，欧阳修功利主张对后来的王安石等人是有影响作用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代，有些人高谈仁义，轻视功利；有些人则一心追求功利，忽视仁政。前者无补于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后者往往激化了阶级矛盾。欧阳修却把仁政思想和功利目的结合起来，作为其王道政治的完整内容。他提倡用仁政来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又主张从事务实政治来达到挽救北宋社会危机的功利目的，而这也正是欧阳修作为一个大政治家比当时一般人的高明之处。

注 释

- [1] [2] [3] [4] [5] [6] [12] [13] [17] [19] [21] [22] [25] (明)茅坤. 唐宋八大家文钞(一).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836, 836, 492, 362, 836, 476, 542, 448, 467, 468, 333, 466, 328, 556
- [7] [8] [9] [10] [14] [15] 文渊阁四库全书. 文忠集(一).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3, 358, 358, 443, 321, 598, 598.
- [16] 文渊阁四库全书. 文忠集(二).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3, 36
- [18] (元)脱脱. 宋史.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3149
- [20] (清)毕沅. 续资治通鉴(一). 长沙: 岳麓书社, 1992, 591, 593
- [23] (宋)洪迈. 容斋随笔(上册).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67
- [24] (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3376
- [25] 刘子健. 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 台北: 新史丰出版公司, 1984, 253
- [27] 曹德本. 宋元明清政治思想研究.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7, 5